

*Emotions in the Field: The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Fieldwork Experience*. James Davies and Dimitrina Spenc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76 pp.

簡美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因長期田野研究工作的特性，以及人類學這門學科自 20 世紀初之發展開始即重視土著與在地觀點，人類學家在田野研究過程裡的個人接觸與遭逢，在民族誌的書寫裡越來越被重視。尤其 1980 年代起，這些個人的接觸與遭逢，與民族誌的書寫與知識建構之間的關聯，已是不能被忽略的部份。在這樣個人的經驗裡，人類學者自身的情緒與情感，如何與民族誌研究及書寫間產生關聯？在人類學著述中，與此相關也最為人所熟悉的，其一為 Malinowski (1967) 過世後，妻子出版了他的田野日記 (*A Dai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其二則是 Levi-Strauss (1963) 廣為閱讀的著述《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此二書對於人類學者在田野裡的情緒，以帶著自省與告白的風格進行描述。這本由 James Davies 與 Dimitrina Spencer 共同主編的 *Emotions in the Field : The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Fieldwork Experience* (《田野裡的情緒：心理學與人類學的田野經驗》)，延續此關懷，並進一步挑戰情緒在心理學與人類學的田野研究與理論建構中的重要性。

在本書導論 Davies 指出所有關注情緒與知識論的研究，都蘊含對後現代主義與「傳統」經驗研究 (traditional empiricism) 的批評與對話。就前者而言，本書反對主觀與客觀的二分，並認為研究者的情緒與人類學知識的關聯應該受到重視。而相對於傳統的經驗研究，本書延續 William James 的理論關懷，提出基進的經驗研究 (*radical empiricism*) 作為方法論的底層。他們認為過去被掩藏與忽略的研究者情緒經驗，事實上提供研究者一種解讀的機會。再者本書也批評前一典範的傳統經驗研究方法論，欠缺對人的關注。通過本書的書寫，作者們想推動一種新的，重新回到關注人之經驗與情緒情感的研究方法 ("re-humanise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他們尤其想將情緒從研究方法的

邊緣位置拉回核心，探討如何通過田野中的情緒，來了解生活世界的情况以及人與社群的互動與關聯（pp. 2-3）。

本書的另一層底蘊是人類學對於情緒與情感的民族誌研究。Davies 在導論中以情緒與情感人類學史的不同時期來闡述田野中的情緒與人類學研究及書寫的不同關聯。對於 1970 年前的人類學作品，他以 Malinowski 的日記與 Levi-Strauss 的《憂鬱的熱帶》為例，指出兩位在理論上有卓越貢獻的人類學家，雖然在這兩本書分別寫下他們對田野的自省與告白，不過並未對後來的人類學研究方法產生有系統的影響。因為在那個年代，田野經驗與人類學理論之間是被認為可以相互切割與分離。70 年代晚期到 80 年代初期，雖然還是以反省的方式來面對民族誌的田野，但田野工作已經逐漸被認為是一種「互為主體的實踐」。在這個時期，本書提到了 Renato Rosaldo (1980) 的切身感受，並以此為例說明田野裡的情緒如何能作為了解地方知識的入口。因為妻子不幸喪生在菲律賓 Ilongo 的田野，歷經喪妻之痛的 Rosaldo 說他才真正能理解有獵首習俗的 Ilongo 社會所謂「傷痛足以弑人」的意義。如是脈絡下，情緒不再是非理性，而是人類學者洞察的源頭。延續 80 年代的情緒研究，90 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學對於田野裡的情緒與非系統的經驗，對於方法論與知識論的意義，有了較多也較為仔細的論述。這時期的突破，可以 Gananath Obeyesekere (1990) 對 "detachment" 的重新界定，以及 Michael Jackson (1989) 對於主觀與客觀二分，以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二分的顛覆。Obeyesekere (1990: 227-228) 認為 "detachment" 並非相對於方法論上的客觀性，而是一種能置於經驗外的能力。Jackson (1989: 3) 則認為知識源自互動與互為主體，所謂的客觀其實是一種防衛。讓我們能從現實中沒有系統與沒有結構的經驗中，全身而退（pp. 3-14）。

本書延續前述對於情緒和情感與民族誌書寫的學科史、情緒研究的方法論與知識論之關懷，分為三個主題來論述。第一部分為「田野經驗中的心理學」，第二部分為「田野中的政治情緒」，第三部分為「非認知的田野經驗」。每篇文章的作者都以個人獨特的立場探討在不同場域的田野工作中，如何使用情緒。他們也聚焦於如何從一些看似與知識無關的經驗，發覺其中所具有的詮釋、知識論，以及實踐的價值。（尤其，這些看似無足輕重的、情緒的、身體的經驗，往往被追隨客觀主義的傳統經驗研究所揚棄）。第一部份的各章，主要運用精神分析與心理學觀點，來理解研究者在田野中的主體性。

如 Davies 所指出的，雖然自 Durkhiem 以來，「社會」就不再被認為是個體的總和，而且也不能簡化為心理的層面；然而，即使有人不認為心理學與社會學或人類學之間有多大的關聯，但也不能忽略心理學能幫助我們探討研究者的主體性。Jackson 在本書第一章討論田野工作者的中介狀態，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他指出研究者在田野的心理狀態是脫離熟悉的生活世界，進入一個陌生的新環境。研究者必須面對這種中介的，方向未明的壓力。而要擺脫這種錯亂的狀態，傳統上多半以建立客觀與系統的知識作為解決之道。但是在這篇文章 Jackson 則採取不同的辦法來因應他在田野裡的焦慮。他採用 Kuranko 社會的夢占以脫離自身困境。由此他不僅了解夢在 Kuranko 社會的重要性，而且也理解到一個特定的文化，如何為人類社會常見的一種中介的、未完全磨合與未明之心理狀態和經驗提出解決之道（pp. 15–16）。與 Jackson 相呼應，Davies 在本書第三章處理田野經驗與情緒的辦法，則挑戰傳統經驗研究的客觀主義。面對田野中不熟悉與不自在的狀態和經驗，他認為人類學家應該留意的不是那些常見的研究方法，或是因人、因時而異的處置之道，而應該是民族誌工作者在田野工作時即興的「退縮策略」。例如，有的人類學家會找個地方躲起來一段時間，有的人則以更多的時間聽錄音帶或寫田野筆記。Davies 認為人類學家可能未完全意識或體認這種以退縮來適應田野的經驗在研究方法上的意義（pp.17, 83–86）。

本書第二部份討論人類學家自身在田野所遭遇的創傷與政治險境。此部分三篇文章的作者分別通過不同社會與不同階段危機的情緒經驗，探討政治與個人間緊密關聯的細節。而在產出民族誌知識與置身政治掙扎的同時，也突出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所共享的主體空間，以及相互介入彼此的生活。Ghassan Hage 在本書第五章細膩地探討 2005 年以色列攻擊黎巴嫩後，他所感受到一股反以色列的憤恨氛圍。Hage 以「政治的情緒」來呈現他與報導人所共同體驗的情緒，並以 *emotive imagining* 重新解釋 Benedic Anderson 所提出的想像共同體。Hage 以黎巴嫩人對於國家與國族的情緒經驗指出對於國家的認同，不是抽象的想像，而是具體的情緒與情感想像。Hage 也對「參與觀察」提出修正的觀點。他認為要在危險的政治環境裡進行參與觀察，是處於情緒參與、分析參與，以及政治參與，三種參與類型間的相互協商。Hage 說，這是一種「民族誌的搖擺」（pp. 18–19）。第二部分的另兩篇文章，分別由 Elisabeth Hsu，以及

Lindsay Smith 與 Arthur Kleinman 所書寫。此兩篇都涉及研究者個人在情緒和政治的經驗上所理解與再現的當代中國處境及變遷。呼應 Hage 所稱之情緒的參與，Hsu 面對的是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以及此事對她在田野過程中，所引起的重大情緒挫折。相對的，Smith 與 Kleinman 的文章則呼應 Hage 所稱之政治參與。Smith 與 Kleinman 以細膩的民族誌寫法描述如何介入他者，以及由此所衍生之棘手的政治處境。作者指出這種介入並非來自倫理或分析上的決策，而是源於同理心與人性所展現之情緒和情感聯結（pp. 18–20）。

本書第三部份提出「非認知的學習模式」。強調人類學者在田野裡通過身體、情緒、想像等非認知的管道進行文化學習，並以此尋得理解其他社會與文化的知識入口。在本書第八章 Kirsten Hastrup 指出，田野裡的情緒，不僅來自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人與人互為主體的關係，也來自研究者與田野中的物質環境間的互動。Hastrup 以 "raw moment" 表達她在冰島田野裡獨自步行於冰天雪地的經驗。這個經驗與步行的時光，使她得以在心理上順利進入探索冰島地景與社會文化。Tanya Lurmann 在第九章則以宗教教徒的研究，反思方法論。Lurmann 認為在田野裡，除了研究人的論述與行動，也還應包括被研究者個別的傾向與興趣。換言之，即使同屬一個文化，每個個人所經驗到的，以及文化能對個人產生的影響，都不是完全一樣。這個包含著身體、情緒與心理等諸多層次的特性，影響著我們如何涉入與再現一個文化，所以在研究方法上應該有更為核心的位置（pp. 20–22）。

人類學與心理學之間有著長久的對話與合作的關係，本書以關注田野研究者的情緒經驗，進一步論及與研究方法及民族誌知識之產出的關聯。經由這個面向的切入，也讓田野研究的複雜性以及與人性的互動，通過本書各篇作者的親身經驗與書寫，得以具體地表達出來。在過去有關人類學研究方法的諸多書寫與探討，研究者在田野裡的情緒、情感與身體的經驗，雖被論及，但是如本書所說，是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本書以田野裡的情緒經驗為匯集點，使人類學與心理學在這樣的場域合作書寫，這對於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乃至民族誌知識的書寫與產出，不僅具有積極的反省力，同時也是一種學科知識史與方法論的論述。這使得我們在人類學所熟悉的田野技藝，如參與觀察，或身處異文化田野的焦慮心情，皆得以轉化為更加細膩與多層次的方法論。本書特別推薦給所有對於田野研究工作的研究方法及其反省有興趣的人類學或心理學的學者與研究生。